

市场模式的演化

自我调节市场与虚构商品：劳动、土地与货币

经济：制度化的过程

为市场定位

反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

资本主义市场：理论与现实

经济学与世界史

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矛盾

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乌托邦与危机

历史视野中的劳动力供给

经济啊，笨蛋！工业政策话语与身体经济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

Anti-market Capitalism

许宝强 渠敬东 / 选编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

Anti-market Capitalism

许宝强 渠敬东 /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 / 许宝强, 渠敬东选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9

(另类视野: 文化 / 社会研究译丛)

ISBN 7-80109-391-7

I. 反…

II. ①许… ②渠…

III.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市场经济—研究—文集

IV. F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762 号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

许宝强 渠敬东选编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mail: cctp_edit@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2.62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31200/01

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译丛

编委成员

汪 晖 宋伟杰 袁 伟 许兆麟 孙 歌
许宝强 陈顺馨 刘健芝 戴锦华 罗永生

编辑顾问

Giovanni Arrigh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Tani Barlow

Wome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Chen Kuan - Hsing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Muto Ichiyo

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re, Tokyo, Japan

Mushakoji Kinhide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Yokohama, Japan*

Meaghan Morris

Fellow of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Ashis Nandy

*Directo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New Delhi, India*

Sathy Prasartset

Faculty of Economic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Sherry Simon

*French Department and Humanities Doctoral Program
Concordia University, Canada*

Tejaswini Niranjan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India

Immanuel Wallerstein

*Fernand Braudel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UNY - Binghamton, USA*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 汪 晖

二战以降,不仅在东西方之间,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有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战持续进行,其中关键性的论题涉及理论 and 政策等不同层面: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与自由竞争的关系,如何处理计划、调节等经济手段与自由放任的关系,如何处理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关系,等等。这些尖锐的论战承续了 19 世纪古典经济学所确定的相关概念,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理论性的,毋宁说是政治性的:应该选择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限制自由市场的运动,还是以自由市场瓦解国家干预,获取更大程度的自由?应该利用国家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是听任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当前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只有置于上述讨论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它并没有在概念的层次对这些争论进行回应,毋宁是在政策的层面调和两者的意见,以期找到一条适应当代社会变化的新道路。

自 1980 年代开始,上述论战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在中国知识界和国家决策过程中重新出现。这一论战发生在国家推动的经济改革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与改革这一体制、创造新的市场制度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主要内容。对内,国家通过放权让利、发展企业自主权,以及私有化的方式,将市场关系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 1

域;对外,通过外贸体制改革,逐渐地将中国纳入到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基金组织主导的全球市场关系之中。在这一背景条件下,自由市场理论、自由贸易论,以及相应的政治理论迅速流行,构成了对于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的尖锐批判;而另一方面,在市场扩张过程中,贫富分化、资本外流、社会不公、生态危机、失业、腐败等等现象迅速蔓延,社会对于公正和保护(社会福利和保险)的需求日益强烈,从而在知识的领域重新出现了新的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各不相同的批判思想。因此,几乎与1940至1960年代的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不同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急切地探讨变革的方案,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理论冲突。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传入中国之时,立刻产生了热诚的呼应,对于那些既不满意于现实、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人来说,有什么概念比这一“第三种”许诺更为诱人的呢?

我认为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思考面临的困境具有参考意义。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最近十年的中国知识论战中重新登场,他们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回应方式为当代仔国知识界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特殊视野。这两位欧洲作者以历史研究的方式重新考察19世纪有关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诸种论题,一方面颠覆了亚当·斯密以降逐渐形成的有关“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神话,另一方面也力图摆脱这一时代日渐盛行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模式,质疑论战双方所共享的一些基本前提。这两位作者均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自觉地与各种各样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规范式的叙述方式划清界限,从而清楚地揭示出历史中的“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如何依赖国家、权力和垄断。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这一论断正是从这一历史研究中产生的结论。他们没有提出任晃一劳永逸的模式作为社会改造的方案,但从概念上构成

了对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调和形式的质疑。

我们没有必要将任何一种研究、任何一种视野夸大成为惟一的或者最为重要的发现,相反,我们能够做的是将这些新的视野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之中。没有 18—19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没有那一时代的思想提供的种种预设,或者,没有 20 世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战,没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出现这类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思考。从他们的著作诞生开始,已经有无数的学者从各不相同的方面对他们的历史预设和理论研究进行探讨和批评,而他们的后继者的著作也不断引发新的思考和争鸣。事实上,将历史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基本动力和过程置于思考的中心,力图从具体的历史关系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另类方案,这一方法论本身已经招致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和误解。某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批判性的、叙述性的方法,说不上是理论的研究,无法在规范的层次提供建设性的方案;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以为这一叙述保留了市场交往的概念,从而无法与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计划区分开来。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批评?在这本精心挑选的文选出版之际,我愿意将自己阅读这类著作的片断感想记录下来,陈述我的看法,供读者参考和批评。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许宝强先生已经就本书各篇论文的主要观点作了摘要的分析,我在这里不再重复这些具体观点;第二,我本人不是经济学家,如果本文在某些方面涉及了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么,我所做的批评不应被理解为对经济学的否定。这里有特定的语境,而且我也深知一些经济学者正在汲取各种理论的和历史的资源,突破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困难。本文所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重新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方法及其基本结论的思想史意义。

一、实质与形式

1. 形式主义经济学与经济体的运动

博兰尼和布罗代尔被公认为杰出的经济史家,他们开创的历史视野为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布洛克(Fred Block)、贝罗奇(Paul Bairoch)、阿尔利吉(Jiovanni Arrighi)等人所发展。这些学者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历史的、尤其是经济史的方式,从而很少有人将他们视为经济学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历史学家、人文学者认真研究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并以此作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然而,经济学家们却很少有人仔细地阅读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作品。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学科制度遵循着一套划分知识的基本规则,按照这个规则,历史著作无法进入科学(经济学)的范畴却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正由于此,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下述两个问题才能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意义:第一,如何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方法论?这一问题可以替换为另一个听起来有些古怪的或不言自明的问题,即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是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第二,为什么现代学科、特别是以经济学为其“数学”的社会科学必须采用科学的或规范的形式,从而将历史叙述排除在理论范畴之外?我在这里将科学的与规范的这两个概念并置在一起,一定贻笑大方:规范的概念与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如何能够混为一谈?例如,哈耶克、哈贝马斯的理论都是规范性的理论,但他们对于以实证主义为内核的科学主义给予尖锐批判,难道不是一个基本事实吗?确乎如此。但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科学形式与规范形式难以截然区分:

科学在这里是一种特殊的叙述形式,它要求将实际的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或政治过程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多样的历史关系,从而它与规范式的叙述一样都是形式主义的理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与规范的这两个术语并无根本冲突。

让我从博兰尼的方法论开始讨论上述两个问题。在《经济:制度化的过程》(Chapter 7,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c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ed. George Dalt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p. 139 - 174)和《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的若干章节中(尤其是第1、2、6章),博兰尼反复地阐释了经济、市场等范畴的两层相互区别的含义,即实质的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和形式的含义(formal meaning)。博兰尼说:

经济的实质含义源于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和他的同伴。它是指人与其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换,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为他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

经济的形式含义源于手段—目的(means - ends)关系的逻辑特性,这在“节俭的”(economical)或“节约的”(economizing)这样一些词语中体现得很明显。它指的是这样一个确定的选择状态,即因为手段不足会造成要在手段的不同使用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们把决定手段选择的规则称作理性运动的逻辑,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逻辑变量用一个临时的术语来表示,即形式经济学。⁽¹⁾

在这里,博兰尼严格地区分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认为只有后一概念才能用于对实际的经济过程或经济的经验形式(empirical economy)进行考察。这是因为实质性的经济活动绝不

是抽象的市场活动,而是被嵌入在各种人类生活、各种制度和文化之中的过程,它无法按照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及其规范运动。此后有些经济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区分,例如布洛克说:

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个概念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但直到19世纪晚期,当边际主义者提出关于产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之时,这种思想才得以系统化。在这一模式中,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都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买卖,因此价格变化将使供求达到平衡。许许多多交易通过价格机制媒介,达至一般经济均衡,其中所有资源都会按照可能采取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利用。^[2]

对于经济和市场的形式主义理解为微观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它的核心是以价格体系作为媒介自动调节供求关系。按布洛克的说法,经济学家们可能对各不相同的市场如何促成了宏观经济整体疑惑不解,但他们仍然习惯于在边际主义的框架内解释这些市场。然而,除非存在着将所有各种市场连接在一起的完整的网络,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一市场的任何一种均衡会有助于宏观经济的效率。这里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困难,但为什么——正如博兰尼注意到的那样——现代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都混同上述两种含义,甚至像韦伯、帕森斯以及批评过这一现象的门格均没有认识到区分这两种含义对社会学分析的重要性呢?

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如下事实,即经济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重叠建立在一种“偶然的”发现之上。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曾把价格体系的协调作用看作是一种偶然被发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他认为,正是这一偶然发现为现代经济和社

会提供了范式。按照他的理解,这一自生自发秩序既是历史的,也是非历史的;作为一种对历史关系的偶然发现,它是历史的(不是个别人的理性制造或设计);作为一种不能等同于任何历史的现实关系的自生自发秩序,它是非历史的。^[3]哈耶克将那些经济学家的“科学模型”斥之为科学主义的谬误,认为这一思想方式可以追溯到欧洲思想中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传统。他的理论的核心在于呼吁人们尊重内在于历史的秩序。这一关于历史的“内在的”理解从另一层面将经济或市场的实质含义与形式含义重叠了起来,因为我们实际上找不到一种明确的标准对此进行区分。博兰尼的解释与此略有相似之处,他认为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所以能够重叠纯粹出于“逻辑上偶然的情境”:^[4]“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出现的一种人类生活的组织形式当中,选择的规则恰好适用于此。此种经济形态是一种市场定价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易行为的进行涉及参与者对交易手段的选择,因此这一体系的运作适合于以经济的形式含义为基础的方法。“一旦这种体系支配了经济体,经济的形式含义和实质含义实际上就会重叠起来。”^[4]

如果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重叠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那么,对于市场价格的形式主义描述或规范式描述(对于在给定情境中的选择方法的描述)就不能等同于市场体系的实质过程。哈耶克所以将价格体系视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一种既从属于历史又不等同于历史现实的范畴即是为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价格体系和市场的研究仍然是一种形式的研究,而不是实质的研究。^[5]博兰尼注意到了这一重叠的偶然性质,却没有把这一重叠视为一种内在于历史的普遍秩序的呈现;他相信如果仅仅借助于为特定的经济形式(它总是依赖于特定的市场)而设计的分析方法,就无法分析经济体的运动过程本身,因为所谓经济体的运动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各样的制度、国家政策、传统、习俗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 7

和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绝不能化约为单纯的以价格为中介的供求关系。换言之,尽管博兰尼也注意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的某些重要因素,但他拒绝对这些因素进行内在论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解释,拒绝将这一秩序视为代表整个历史的秩序。因此,他根本不相信19世纪资本主义乃是中世纪以来市场活动持续扩张的自然结果,恰恰相反,他指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是由于国家的有计划的重商主义政策,亦即某些建国策略的副产品。所谓“自律性市场”必须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这一分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安排。

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例证说明实际的经济过程与形式主义的经济理论之间的悖谬,本书各篇的论点几乎从各个方面提供了例证,这里无需重复。我在此仅举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例子说明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的短缺经济时以一种比较的方式解释说,中国不存在西方经济的那种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恒等关系,原因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价格随供求波动,总供给的价值量与总需求的价值量能够自动调整以达到适应,而中国的经济形式是一种计划性的经济体制,价格受到管制,总需求经常大于总供给。但是,价格在具体交换过程中的这种平衡作用对于总量平衡并不起多大的作用,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即使在价格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时期,剔除进出口因素,中国的国民收入总生产额也始终等于国民收入总使用额。^[6]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妨碍许多经济学家继续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处理各种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在他们看来,任何叙述性的研究都无法构成规范性的理论,而只有规范性的理论才能提供建设性的方案。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上述关于中国短缺经济的讨论犯了两个基本错误:第一,把“西方经济”这一实质概念等同于“市场经济”这

一形式概念,从而误以为“西方经济”中价格是随供求波动,无法解释西方经济现象中的所谓“价格刚性”现象;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价格调控一直存在着,今天,它仍旧存在”,其作用是保障竞争。^[7]第二,把在微观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扩展为宏观条件下的供求关系,却完全忽略将各种市场和经济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制度条件。放弃对于后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了解为什么在所谓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能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错误源自将作为一种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这一形式的概念(这一重叠在某种意义上也源于博兰尼所谓“逻辑上偶然的情境”)。即使在两三年前,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不承认中国存在市场疲软(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象,理由是:中国仍然处于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它的支配性特征仍然是“短缺经济”,怎么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博兰尼的方法论对于解释这一现象有着特别的说服力,这是因为他将实质性的经济体视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地提供能够满足需要的物质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了解所谓“短缺经济”中的剩余现象,就必须观察总需求和总供给获得平衡和出现失衡的复杂过程,而不是仅仅在价格与供需的形式主义分析中寻找答案。换言之,有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从而按照这一站不住的描述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

这类明显的判断错误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以经济的形式含义去描述实质性的经济过程。为什么如此?学科及其规训制度的作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至少解释了形式主义的经济分析如此盛行的制度基础。但问题显然不止于此。市场主义的抽象模型不仅是经济学的学科模型,而且也是国家和其他力量对于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规划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有关市场制度及其

模式化的研究,也就无法在宏观的(通常来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但现在已经发展为全球性的经济规划)层面对社会进行规划,也无法劝导或诱导人们按照这一模式行动(如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动)。在一定意义上,形式主义的经济和市场概念成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史(以及知识史、思想史以及伦理学)问题,它所追问的不仅是市场运动的规律,而且是为什么人们必须按照市场的法则行动!

因此,市场经济规划的实质含义依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互动的历史关系。博兰尼对经济体的运动的实质性的描述方法不是一般的历史叙述方法,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他对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不仅产生于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而且还产生于以新的方式重构 19 世纪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努力。博兰尼的“实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完全一致,它指的是嵌入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之中的经济过程。但博兰尼并没有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或其他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之中,他的“重构”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在我看来,对于博兰尼的方法论视野的讨论需要置于双重关系中:为什么恰恰在经济学的时代,博兰尼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这一政治经济学视野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何在?

2. 作为社会科学总体的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家以一种方法论的差异来表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他们嘲笑政治经济学家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与政治经济学家相比,现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范围要狭隘得多,他(她)首先关注的是专业性的、学科性的领域,对物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服务进行严格的研究,并以计算或统计数据的方法表述其研究结果。因此,许多人将经济学家视为特殊的数学

家,经济学也经常被视为社会科学的“数学”。对于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其他环境条件的研究,如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习俗和情境,通常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或文化学家承担。换句话说,经济学与上述各种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在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瓦解的过程中诞生的。

19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被视为经济学的起源,但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从而不存在用经济学的手段去衡量政治经济学的理由。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批判无非是现代经济学的自我确证。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 19 世纪末,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人的活动却早在半个甚至一个世纪之前就展开了。在整个 19 世纪,他们都被囊括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广泛得多的概念之下。^[8]这些人物的理论相互冲突,但同时分享着若干预设、概念和理论,以致人们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理论的历史学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这一社会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而马克思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9]1848 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道:

就国家的经济状况取决于自然知识的状况而言,它是自然科学的主题,艺术以此为基础。但是,就其原因是道德和心理的——依赖于制度和社会关系或人性的——而言,对它们的研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属于道德或社会科学,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0]

政治经济学不相信存在离开社会政治体系的经济过程,也不

相信存在离开经济过程的政治和其他文化过程。用安吉斯·沃尔克尔(Angus Walker)的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是社会科学(Political economy was not a social science, it was the social science)。⁽¹¹⁾

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的关系,它认为经济过程是内在于制度的过程。上述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信念完全背道而驰。说到底,所谓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无非是一种历史视野。然而,现代经济学所以能够以一种科学模式的狭隘方式讨论经济过程,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解经济的历史视野,但作为一种知识,它没有能够将这一视野贯彻到底,即对经济体的运行进行实质性的描述。因此,博兰尼对于形式的和实质的区分针对的不仅是现代经济学,而且也必将引申出对于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假定的批判。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得费点笔墨加以叙述。

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苏格兰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成员试图通过历史的研究在那些各不相同、互无联系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进而提供有关社会变化的一般理论。从这方面看,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存在于两个方面,即科学方法的方面与历史信念的方面。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说,苏格兰历史学派的诞生与17世纪以降的科学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沃尔克尔在探讨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时将他们的工作与17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联系起来,他说,17世纪以降的科学发现用收集证据、组织秩序的方式说明自然世界,这一方式启发了亚当·斯密及其朋友重新总结牛顿、洛克、孟德斯鸠、林奈、重农学派及其他学者在哲学、科学方法、物理学、生物学、政治思想和法理学等方面的发展,他们发现这些伟大的知识进展未能

形成对于人类进步的一般描述,于是决心填补这一空白,将科学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中,进而在理论上论证现代文明的兴起。包括哈耶克在内的理论家将历史主义归入科学主义的范畴,其理由正是基于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过分地依赖科学方法,它不可避免地忽略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与社会的根本性的区别。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格兰历史学派产生于欧洲的商业化或世俗化的过程之中。从马基亚维利到路德宗教改革,政治领域本身正在从宗教的世界向世俗的世界转化:政治逐渐从信仰的领域蜕化为一个管理的问题,进而又从对主权的关注发展为对于个人主体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市场关系的发展与个人主义政治权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假定得以确立:市场的充分运动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的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一假定立刻伴随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即一方面市场的运作需要个人自由及其对财产的处置权、需要自由获取他人的劳动和财产权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及其规则(包括财产权)无法离开金融、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的保障。后一方面也可以表述为市场的运作无法离开个人对于主权的政治权威的服从。为了克服这一困境,洛克等人试图用商业社会的概念即个人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契约”来定义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则相反,他试图将社会描述成为个人、阶级、法律制度,以及各种体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社会安排不再被理解为政治决定的产物,而是社会内部各种要素相互运动、自我调节的结果。

因此,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提供了政治权利关系的新的构想,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为市场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场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1846年,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论证了生产、商业和消费的假定形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 13